

百年考古带动人文学科发展

□ 江林昌

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致贺信。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意义。100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揭开了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增强了历史信用”，理清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而且，中国现代考古学还用更多的实物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为期10年的科学发掘。这些标志了中国人自己主持现代考古学的开始。100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考古学区系类型说与考古学聚落形态说的广泛实践与理论总结，都标志着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已初步形成。考古学家们已就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甘肃敦煌经卷、西北汉晋简牍的发现，引起了一批著名学者的高度重视。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该文用甲骨卜辞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世系基本可靠，又纠正了其个别世系的错误，还补充了遗漏的世系。1925年，王国维先生应聘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作的第一场学术演讲便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同年，他编上课讲义《古史新证》，又提出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时隔5年，到了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

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先生在给他的学生陈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进一步强调了考古材料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让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具体生动的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学新图景，改变了一系列传统的观念。10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不仅促进了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进步，而且也带动了在中国古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大发展。

历史学方面。考古学从时间上打破了历史学上的“上古无史论”片面认识，建立起了绵延发展、从未中断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考古学又从空间上改变了“中原文化一元论”的传统观念，展示了中华文明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多个区域同时独立并起，犹如满天星斗的灿烂图景。不仅如此，考古学还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文明从五千多年前起源后，在五帝时代表现为“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夏商周表现为“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秦汉以后表现为“多元一统”发展格局的总趋势。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本科教学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通史”必须重新改写了。

文字学方面。考古学揭开了《说文解字》以前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商周青铜铭文、商周甲骨文、夏商以前直至五帝时代的玉器刻文、陶器刻文。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汉字从五帝时代萌芽、夏商发展、西周成熟、周秦转化的发展脉络，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汉字系统以外的东夷古文字、巴蜀古文字的实物片段。从学科角度看，考古学使传统的“《说文》学”、“小学”发展出了新时代的“甲骨学”“金文学”“简帛学”以及“战国文字”等新分支。

文学方面。考古学提供的地下文学文本，不仅可以解释地上传世文学文本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还揭开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文学新现象。如，“志怪小说”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而不是以往文学史教材所说的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槁颂体”“发问

体”在屈原之前已经出现，并盛行于战国时代，而不是既有文学史教材所说的为屈原所独创；周秦汉魏时期在社会底层曾经盛行过“民间俗体赋”，与汉代“贵族文人赋”并行发展，而以前文学史教材对俗体赋却是茫然不知。又如，现行流传《诗经》只是孔子整理的一种删节本，在西周时期“诗”的面貌更丰富，数量更多，流传系统更复杂；《九歌》也并非屈原仅仅对长江流域楚地民歌的加工整理，而是屈原对黄河流域东夷部族、华夏部族与长江流域楚部族及土著部族等众多远古部族史诗、颂诗的传承整理、加工润色，再附以自己的创作综合而成。总之，考古学颠覆了许多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认识。

文献学方面。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为我们全面整理研究先秦秦汉文献典籍开创了新局面。利用这些出土文字资料、文本资料，我们可以辨别古书的真伪与成书年代，梳理古书的源流与体例，校勘传世文献的错误，填补传世文献的空白。一个“重建中国古典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考古学对文史学科的推动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事实证明，凡是有理想有抱负，而且能作出重要成就的文史学者，都高度重视考古发掘新材料，紧跟考古学的步伐。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从事先秦文史的大家名师，都极其重视考古。他们从方法论到学科建设，都为我们开拓了新境界，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2020年，教育部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其宗旨就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推动中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强多学科交叉，推动人文学科融通发展。我们相信，中国考古学必将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从考古看文明

科举制与基层治理

□ 顾 春

科举制度不仅在隋唐以降重新整合了政治权力结构，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体现在基层社会运转上。

在基层治理方面，科举制推动形成官不下县、官绅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统治阶级通过郡县制和编户齐民，把全社会的官和民都统管起来。在编户齐民下，以男耕女织得以维系的一家一户成为社会细胞，是传统社会及其经济组织的最基本单位。一家一户在组织形式上十分松散，在经济方式上十分简单，这种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制度所要求的政令畅通、上下一致的政治特性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后来，统治阶级逐渐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利用长期存续的宗族组织和人所共知的祖先崇拜观念，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就好像用一条线把众多的铜钱串起来一样。在这其中，科举制度发挥了作用。

科举制度鼓励百姓读书做官，使天下人通过读书习君臣之理，学治国之道，行忠孝之德。统治阶级给做官者以种种特权，这既符合等级社会的观念，也提高了官员的权威和做官的吸引力。个人做官，宗族荣光且受益，于是各宗族为了光大门庭，就大力提倡子弟读书。这些读书人出仕之前，可以影响族人和乡里，科甲及第后，则受事管理百姓。而久考不中的秀才，则因享有平民所没有的见县官不跪、免除差徭、因公事可累见县官等特权，往往成为宗族的族长。未考中的读书人和返乡的退休官员逐渐形成了士绅阶层，并在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士绅阶层不仅大多掌握着宗族的人权和财权，在本宗族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地方拥有很大的号召力，成为影响乡村百姓思想和生活的重要

力量。

日益发达的士绅阶层的长期存续，为县以下的官绅共治提供了可能。从利害上讲，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官不下县，县以下没有朝廷命官，所以县官就必须借助士绅并通过宗族组织把百姓管理起来。而士绅及其所代表的宗族更是需要依靠县官来提高本人和本宗族的政治地位，获取旌表、奖励等政治荣誉和其他利益，因而必然要服从并维护县官的管理和执政。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讲，因为官绅同源，都是读书人，读的又都是同样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都认同一样的价值观，具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有了以上两条，就自然形成官绅共治的基层管理格局。官绅共治是一种有温度的管理办法。它的基本精神有：主张以德治家、以德润身、以和为贵、人人有了矛盾要首先商量着办；处理问题和矛盾按照“天理、国法、人情”三条而折中折以断。

在科举的激励和刺激下，社会上的读书人大量增加。大量增加的读书人，既可应举，也可为师，因而既是文化普及的表现，又会促进文化的进一步普及，从宋朝开始的蒙学和书院的大兴就是明证。在蒙学方面，一直到明清还在使用的蒙学教材“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中，有两种就是由宋人编纂的，并在宋朝广为流行。最早的书院始于唐代，本是私人读书讲学的地方，到宋代，发展为聚徒讲学和学术研究的所在，最为著名的有所谓六大书院，其中，闻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一直弦歌至今。到清朝，全国的书院达到两千多所，几乎每个县都建有书院。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科举不仅促进了文化普及，还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诗宋词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科举是有关系的。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科举考试科目中，以进士科最难考取，也最为贵重，非在诗赋方面有很深造诣者难以考取。直到明朝，人们还一直认为“唐以诗取士，故诗盛”。科举还推动了儒家思想的飞跃，促进了道学的诞生和成熟。我们可以看到，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中过进士，如张载、程颢、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而心学的集大成者、明代的王守仁也是进士。

文化普及和繁荣的过程，同时也是弘扬主流道德的过程。其中，尊师重教和重视读书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耕读传家的思想久传不衰、深入人心，成为人人应该遵守的人间正道。以上所举，都逐渐被百姓所接受和认同，并成为中华民族家家家教和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海一号”船模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宋朝与海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在唐中期前，陆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国对外经贸文化往来的主通道。但是，到了唐末期，由于安史之乱与经济中心南移等原因，促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北宋时期，北方有辽国、西北有西夏。南宋时期，北方有金国对峙，朝廷偏安江南。由于长期受辽、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威胁，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宋朝不得不重视和发展海外贸易。因此，自北宋以来，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开始向海上转移，海上丝绸之路顺理成章地成为宋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新通道。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宋代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技术位于世界前列。造船工艺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造船业长期以来都较为发达，而宋代造船业可谓是中国古代造船史中的高峰。宋代造船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三大造船中心为泉州、广州和明州。北宋官营船场主要生产纲船、座船、战船、马船等，例如北宋真宗末年，纲船产量就达到了近三千艘，产量十分惊人。南宋时期，私营船场较为发达，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船舶。先进的造船技术助力宋代船舶遨游在宽广的海洋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

从造船方法看，宋代船舶使用最先进的船模放样，选用材料优异，制造技术精湛，船身结构合理，船体坚固耐用，能建造多层船壳板、桐油加铁钉、高强度水密隔舱、可倒桅杆、平衡舵、坚固舱座等。宋代船舶具有载重大，速度快，船身稳，抗风浪等优点。相对而言，宋船能够更安全地驰骋于海上。宋代造船技术，在规模和制作工艺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造船业。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就是宋代先进造船技术的有力证明。

宋代航海技术

宋代航海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宋船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如罗盘针、转轴、避水舱等。经验丰富的海员通过信风、洋流、牵星术（即天文航海术）来判断天气和潮流，以此决定出海或是返航，通过罗盘导航、针路图、更路簿等航海技术以记录航线、计算航程，这些都奠定了坚实的航海技术保障。

在海上航行中，辨别方向至关重要，而指南工具是航行安全的基础。如《萍洲可谈》记载，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代航海指南技术的发展体现在对指南工具的掌握，主要表现为两点：人工磁体代替了天然磁体，磁针代替了磁勺。彼时的海船已普遍使用罗盘指南针代替“指南车”。宋代磁针罗盘定方位的方法有“碗唇法”“缕墨法”“指甲法”“水浮法”等，罗盘指南针在航海导航中测定方位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熟练掌握航海工具和天文水文知识等，宋代的导航技术大幅进步，不仅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而且促进了宋代航海史的发展。可以说，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开阔了海上航行的视野，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兴盛。

宋船远航能力

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远航能力的象征。宋代凭借着优质的海船、成熟的航海技术使远航能力获得提升，当时的南洋和印度洋上往来驰骋的几乎都是宋船，蕃商也愿意乘坐更安全可靠的宋船。宋代海船已能远航到地中海乃至东非。如今，非洲东部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多次出土宋钱。同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区域广大，不但近海航行繁荣，而且远洋航行也很发达。近海航行主要驶向朝鲜半岛高丽、日本、澎湖列岛等地区。远洋航行可以到达整个南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区域，主要包括马六甲海峡以东航线、马六甲海峡以西与孟加拉湾航区、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航区、非洲东部沿海与地中海航区。

另外，远洋贸易需要装载能力更强大的船舶。宋代大型海船，如“神舟”“木兰舟”“万斛之舟”增加了远洋船舶的装载容量，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量与效率的大幅提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 潘志宏

高。《梦粱录》记载当时的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船载重有五千料，可以装载五六百人；中船载重三千料至一千料，可以装载二三百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提到“南人有万斛之舟”，可见宋代海船的装载能力。

宋代市舶贸易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交方针及有利往来的贸易政策。相对于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宋朝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较为和睦稳定。宋代发展海外贸易，既有一定的历史地理原因，也与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有关。宋廷面对内忧外患，为了维护政局稳定、发展国内经济，积极对外开放，支持海上贸易，制定了促进航海贸易的经济政策。对于出口贸易，政府鼓励海商到海外贸易。同时，宋高宗提出要“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支持进口贸易，由此发展出宋代的市舶贸易。宋代出口商品以瓷器为主，进口商品以香药为主，故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药之路”。

宋代初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后转化升级为市舶贸易。最初，对于朝贡贸易中，各国贡使的贡物，宋朝政府以“博买”的方式收购，以“给赐”“加赐”等方式作为额外回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朝廷转向重视较为公平的市舶贸易，扩大双方贸易范围。宋朝在各地设置市舶司、市舶务，以便管理市舶贸易。北宋初期朝廷遣使海外诸国“勾招进奉”，邀请外国人来经商。北宋开宝四年，就已设置“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法令、税收等事务。宋神宗元丰年间，制定《广州市舶条法》，设“提举市舶司”，置提举官，负责管理港口通商、监督查私、征收关税，史称“元丰法”。到了南宋，市舶贸易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港口繁荣，贸易增加。当时，宋代外国商人聚居的场所被称为“蕃坊”或“蕃巷”，设置“蕃长”来管理“蕃坊”公事，拥有行政、招商以及司法之职责，还没有“蕃市”“蕃学”等配套设施。宋代市舶贸易港口主要有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市舶贸易对沿海港口的地位与职责、航海路线以及在“元丰法”实施后，“提举市舶司”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关”。

综上所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当时的中国大陆与海外世界的桥梁纽带。宋代继承了唐代以来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远航能力，在此基础上又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在朝廷宽松的政策支持下，官民积极参与拓展宋代市舶贸易，将中国优质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国家和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宋代积极发展和鼓励市舶贸易使国内经济社会得到繁荣，同时也对海外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所体现的航海技术、航海水平与航海精神，展现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辉煌。

